

石懷文池文學論文集

石懷池文學論文集

著者 石懷

發行人 黃新

發行所 耕耘出版社
上海華龍路八十號

分發行所
聯漢口·重慶·成都書店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不朽的生命

靳以

——序「石懷池文學論文集」

我再也想不到有一天我會爲一個比我還年青的人整理遺作，因爲他不能在他那第一本書也就是最後一本的前面說幾句話，我只得破例地寫這一篇序。

可是我知道我也許是最不適宜做這件工作的人，因爲我隨一提筆，他的身體頓然就在我的面前顯現出來了。他是那麼削瘦，那麼沉默，可是他却有過人的精力，他無聲地在紙上留下了那麼多的話，那麼多寶貴的話。突然，像是一個鐵掌扼住他的喉嚨，無情的江水奪去了他的生命。他本不是一個浪漫派的詩人，終日幻想有一天死在美豔的海的懷抱裏；他還要活的，在生活的各方面他都要活的，而且他還要帶領許多人走向活的大道。可是，他竟死了，死在嘉陵江的下面，埋葬在岸頭的小丘上。我還記得，那已經是午夜以後了，我一個人走向他埋葬的地方，在慘綠的燈光下他躺在那裏，等到一切都妥當了，我重複走下來，我記得立刻起了大風暴，雷來了，雨來了，電閃狂亂地割着那裏沉沉的天空，我默默地想着：「衣人是不甘於死亡的，這是他的最後的聲音。」

在兩年中，他的譯作有七十萬字。那全是在簡陋的物質條件下工作的：粗糙的紙，搖曳的燭火，穿過薄壁而來的寒冷和炎熱，還有他那孱弱的身體。我只能說那是神蹟，可是我不相信神，我們都不相信神的；我以為那是人的最大的努力。

最初看到他的原稿，是一篇翻譯小說：「人民是不朽的。」附來了英譯本，想來是要我為他對看一下的。我如他的意做了，我只在翻譯技巧上看到一些不熟練的地方，譬如句法不順，譯筆費辭，可是他的正確，不苟；充分地顯出作者的苦心和努力。

後來我又看到他的小說，我不得不說他的小說，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失敗了。因為他太年青，他所寫的人物和故事跳不出他週遭的圈子，而且因為他偏重理論，文句間顯得呆板，不生動；可是我還相信將來他能寫好的。

最能顯出他的才能的是理論和批評。（除開失落的，全都在這裏了。）他不發空談，每一個意見都有依據，他絕不信任幻想，也不以自己的好惡為本，他全以多數讀者的意見為意見，根據正確的理論，是非公允，態度嚴肅。一面可以指引讀者，一面也使作者見到衆人的意圖，他不玩弄技巧，批評別人來炫耀自己；他也不站在門戶的私見上，為自己的友人喝采，抹殺他人的一切，他的頌揚和貶斥全是極其恰當的。所以，他的寫作才能，被許多編者認識，他的作品不斷地在許多刊物和報紙上登載。可是他多半用了另外的一個名字——「石懷池」代替了原來的「東衣人」。

在他遭逢意外的前些天，我在泥濘的小路上遇到他了。那已經是夏天，可是風風雨雨的把天地改了顏色。正下着雨，他沒有擰傘，身上却穿了一件濕凜凜的棉袍。

「怎麼，你病了麼？」

「不，我找不到衣服穿，就披上了——我也有點冷。」

「怎麼會覺得冷呢？」我和他點着頭分開了之後心中還不斷地想，感覺着這世界冷麼？就是再冷些，青年人也可以把它燒熱的；而且那時候正是大暑天，一天的太陽就使石板路燙脚板的。後來我想到他是在忙着，忙得把自己都忘掉了。終於，慘酷的現實把他從這個世界上抹掉了。我看不見他那在雨中幌着的瘦瘦的身影，可是他却有了不朽的生命。因為施高得會這樣說：

「生命可以使它不朽的，只要我們把它供獻給不朽的理想。」

×

×

×

×

附記：這是「石懷池文學論文集」的前言。這本書將由耕耘出版社出版，我鄭重地在這裏感謝它的主持人黃寶珣女士，沒有她，這本書一定是印不出的。此外，還要提到他的許多朋友們，在搜集、整理、編排、抄錄，校對上都盡了極大的力，我不過做了這篇短序，這是第一次，我不希望再做第二次，我希望是有生的都盡其生，自己在各方面努力，自己料理自己的事，不再要我這不會說話的人多做無益的饒舌吧。

石懷池文學論文集

目 錄

序

不朽的生命

(一)

1

論歷史小說的創作

(一)

「家事」及其他

(二八)

略談羅曼羅蘭的歷史劇

(四四)

論托爾斯泰的時代思想及其與人民的結合

(四八)

關於 A. 托爾斯泰

(七五)

東平小論

(八一)

論蕭紅

(九二)

——育才學校「啞啞辦」演出觀感

文苑紀感（缺）

文藝需要民主

（一一一）

——從兩個問題談起

反抗庸俗走向人民

（一一七）

——詩人節紀感

3.

評沙汀底「淘金記」

（一一九）

評「一個人的煩惱」

（一二八）

評「春暖花開的時候」（缺）

評兩本戀愛小說

（一三八）

碧野：「風砂之戀」

姚雪垠：「戎馬戀」

幫閒的夢魘「鬼戀」

（一五一）

——徐訏的書之一

略談幫閒和市儈的傾向 (一五五)

——兼評「蝴蝶夢」

4.

論薩科夫的戰爭詩 (V·納斯特洛夫作) (一六一)

伊薩科夫斯基小論 (A·蘇爾科夫作) (一六八)

高爾基回憶斷片 (J·R·布洛克作) (一七二)

土地與人民 (S·魏柏羅斯基作) (一七七)

——論華西列夫斯卡及其「虹」

論西蒙諾夫的「俄羅斯人」 (T·羅柯托夫作) (一九五)

論不朽的人民 (E·克尼包維支作) (二〇七)

論「在苦難裏行進」 (黃定作) (二二一)

「鋼鈦是怎樣煉成的」 (T·羅柯托夫作) (二二四)

現代中國諷刺文學小論（L·包蘇時涅伐作）.....(二三九)

俄羅斯文學與俄羅斯人民（V·日唐諾夫作）.....(二三九)

談蘇聯的抗戰文藝（T·羅柯托夫作）.....(二五〇)

——記第×次蘇聯作家大會

關於蘇聯的戰時兒童文學.....(二五七)

論梭勃萊夫和他底「水兵的靈魂」.....(二六一)

6.

遠行草.....(二七七)

論歷史小說的創作

(一) 在近代新文學中(中國)——

歷史小說的史的發展

一般說來，凡是運用歷史上的材料（人物、事變、戰爭……）給與鋪敍，描寫而成爲小說的，有兩種絕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反動的悲觀的態度，例如十九世紀初歐洲的一些保守的浪漫主義者，他們賴以爲生的封建地主，貴族走向崩潰了，而「新時代」的主人——資本家，高利貸者，商人地主則還沒有與他們結合在一起，或者說已有了他們自己的文化領域的代言人；於是在「新」的社會裏，他們感到孤寂失望，悲觀，退而只得依戀過去，以過去的虛榮，聊以慰藉目前的苦惱，在文學作品中，便產生了那些對於中世紀封建貴族騎士綺麗的黃金生活的留連回憶，憑弔、嘆歌……正如歐陽凡海先生說的：「是些以眼淚洗臉的哭訴」。第二種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由於過去的歷史十之八九都是御用史臣們抹殺了「血的事實」的「墨寫的謊言」，作家爲了使人們理解真實的人類的過去，爲了使人們具體地知道歷史，學習歷史，吸取人類過去的寶貴的遺產，揚棄過去的無用的糟糠，而處理歷

史的科學的態度。如 A · 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便可說是現實主義的歷史創作的典範，（當然，L · 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是更其偉大的藝術的勞作，這兒不過是舉例而已。）他透過一個特定的時代，一個特定的社會來表現一個特定的人物，透過一個特定的人物而反映出一個特定的時代和一個特定的社會的總和，這樣，A · 托爾斯泰便創造了一個真實的不朽的活生生的人物——彼得大帝，他讚美了他，但却沒有忘記他是一個沙皇，更其重要的，他表揚了他的偉大的政績，但如同一根紅線般貫通整個小說的，還是民衆的力量作爲「大改革」主導的決定的力量的。中譯者適夷先生說，「形成彼得大帝藝術的真價值和彼得年代歷史的真實的力量的，不是彼得精神而是民衆精神，民衆才是彼得大帝的真實的主人翁。……」又說：「我們更深一層的看見推動歷史車輪的真正的轉運手，是熱愛祖國的民衆。愛祖國必需愛民衆，而祖國的勝利也必決定於民衆的勝利，我以為這正是彼得大帝的主題，而且也必需成爲一切歷史作品的主題的。」（見譯記）——當然，歷史是不會雷同地重覆的，如某些別有用心的戰國派策士所曲解的一般，（策士們主張歷史是循環的，是兜圈子的。）但是，在某些共同或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在某一個特定的問題上，歷史也真可以和現實酷似到可怕的程度的，這兒，便產生了歷史小說的另一個積極的更富於戰鬥性的任務——「諷刺」。

歷史小說之出現於中國近代新文學中，是頗有其悠久的歷史的，從一九二二年魯迅先生寫的不周山（後結集故重新編時改名補天）作為發端，直到此時此地的現在；所幸的是，雖然如同文學領域內

的其他部門一般，經過開路的長期的探討，摸索，但終究尋出一條路，不，雖然在過去的許多歷史小說創作中，創作者的態度會是怎樣地各不一致，有的僅是在借屍還魂，把歷史人物作為自己的代言人，穿的是古代的衣服，但吃的是麵包，講的是洋涇濱；有的僅僅是在作歷史翻案，對於某一事件不同意傳統的或舊日的史官的曲解，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見解；有的是僅僅捉到一點歷史的根據，而隨意加以渲染，添油加醬，用噱頭和趣味來編織歷史的事件，爭風吃醋而沖淡歷史的嚴肅性和進步性，喧賓獨主而淹沒歷史事件的中心鬥爭。」（見周鋼鳴：關於歷史劇的創作諸問題。）有的「先在腦子裏編好一個歷史鬥爭的主觀的公式來套在一切歷史事件的頭上，把歷史的曲折複雜的鬥爭，簡單化爲單純的公式的鬥爭的概念。」（同上）……但是，作爲歷史小說創作方法的主導契機的，總還是現實主義的道路，而且，由於中國的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提供，我們的歷史小說的創作者更尤其着重於牠的積極性的更富於戰鬥意味的一面，——「諷刺」，這是我們的可寶貴的傳統，在目前正猶待於發揚，而且正被無數的寫作者實踐着。

前面已經說過，在我國近代文學中，用歷史體裁寫小說首先是由魯迅先生提出的，後來，他在故事新編的序言裏補述說：「第一篇補天——原先題作不周山，還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的。那時的意見是想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來做小說，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媧煉石補天的神話，動手試作的第一篇。」此後，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五年，陸續寫成奔月，理水、采薇、鑄劍、出關、非攻、起死等

七篇。茅盾於一九三〇年起也陸續發表了石碣、林沖、大澤鄉等篇，鄭振鐸在東方雜誌發表了湯禱篇，副題作古史新辨之一，但後來似乎也不會見過有甚麼別的作品出現；一九三五年左右，郭沫若在日本的一些留學生辦的雜誌——質文上陸續發表許多歷史小說，如孔夫子吃飯，孟夫子休妻，秦始皇將死，楚霸王自殺，賈長沙痛哭，司馬遷發憤等篇，後曾結集曰豕蹄。再，宋雲彬差不多自始自終是歷史小說領域內的堅貞的戰士，他自己曾說：「我是一個愛好文藝的人，又是一個有點歷史和考據癖的人，但既不能寫文藝創作，在歷史和考據方面，也一無心得，只是抄抄摘摘，編些語錄選集之類，未免被人齒冷。」其實，這不過是他的自歎之詞，郭沫若說：「最近聽朋友講，年青的一代人要讀魯迅的作品是非有註解不行了，這話是完全正確的，不僅年青的一代人，就像我們這一代人，要通曉魯迅作品中的許多新舊故事，恐怕都要有精確的「註解」才行。」（屈原與魯迅）而宋雲彬先生正是這樣的一位艱巨的「註解」工作者，尤其是在歷史小說方面。以前他曾有過玄武門之變問世，戰後也曾寫過不少的歷史小說，他所選註的歷史小品選，對於歷史小說的習作者更有特別的重要性。——最近，我們讀到聶紳聰的韓康的藥店（發表於野草時筆名邁斯）和懷細的咸陽遊（登載於新華副刊），這是歷史小說的新的發展，牠是更發揚了歷史小說的戰鬥的精神的，針對此時此地的現實，以諷喻為職——的作品，由於套上了「歷史的外衣，可能免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這兩篇作品可以說是歷史小說領域內的輕騎狙擊兵，在不久後，當有更光輝的未來的前途的。

(二) 故事新編——

魯迅怎樣寫故事新編的？

假如我們平心靜氣地，把五四以來所有關於歷史題材的創作小說看一遍的話，那末，我們不難發現出，其在創作的態度與方法上，魯迅與郭沫若正可以代表兩種不同的傾向。（當然，都是在大前提——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下的。）魯迅是嚴峻的，是忠實的，正如同他在故事新編序言裏所說：「我是不薄庸俗的，也自甘庸俗的；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爲博考文獻，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爲教授小學，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樣的手腕。」這就是魯迅創作歷史小說的最基本的現實主義的態度。但他在同文裏又曾說：「敘事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爲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這樣，我們通觀他的全部歷史小說的創作，「言必有據者」固多，「信口開河者」却也不少，這，我們認爲是魯迅創作歷史小說的特殊的風格。（其優劣詳論於後。）——但郭沫若則完全是另一套作風，他在豕蹄的序文裏說「我自己本來是有點歷史癖和考據癖的人，在這個集子之前，我也做過不少的以史事爲題材的東西，但我却相信聰明的讀者，也會知道我是始終站在科學的現實的立場的。我是利用我的科學的智識，對於歷史的故事重作新的解釋或翻案，我始終是寫實主義者。」翻遍他的豕蹄，

實在是篇篇鉤稽史實的，當然，這兒並不能就得到結論，郭沫若的歷史小說僅僅的鋪張史實，而沒有任何的戰鬥的意味的，完全相反，它一方面固然根據史實，然而，積極的戰鬥氣息仍是洋溢於紙面，正如同魯迅之創作歷史小說，雖然針對現實，淋漓盡致地向某些開歷史倒車的人加以諷刺，但是，現實主義的謹嚴的作風，仍然滲透着他的全部作品的。我同意宋雲彬的說法：「如果歷史小品這一名詞可以成立的話，那麼郭沫若所寫的全部是歷史小品，而魯迅的作品大都是故事新編。」這兒，我們更大胆地肯定這種說法。「故事新編」「歷史小品」是歷史小說創作領域內的兩條道路，但他們的終極目標是一個，正如同近代中國文學史中，「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一般，是殊途而同歸的，最近韓康的藥店與咸陽遊正意味着這種偉大的創作方法的必然結合。

這兒，我們先談「故事新編」型的作風——

矛盾在玄武門之變序事說：「用歷史事實為題材的文學作品，自五四以來，已有了新的發展。魯迅先生是這一方面的偉大的開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編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種多樣的變化，給我們樹立了可貴的楷模，但尤其重要的是內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編中，魯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銳利的觀察，戰鬥的熱情和創作的藝術，非但沒有將古人寫得更死，而且將古代和現代錯綜交融成爲一而二·二而一。」

這裏，矛盾先生特別提出魯迅創作歷史小說的基本的三根支柱——銳利的觀察，戰鬥的熱情，創

作的藝術，是有其特殊重要的意義的。不過，假如細細體味一番的話，那末，「銳利的觀察」，可以拿來作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的解釋，「戰鬥的熱情」，可以當作他的「信口開河」「不免時有油滑之處」的解釋，而「創作的藝術」，則是魯迅的現實主義的關於藝術手法方面的一貫的態度，是前二者——「銳利的觀察」與「戰鬥的熱情」——矛盾的對立物的統一體；由於這三者，便構成了魯迅的故事新編型的歷史創作小說的崇高的成就。

首先，我們讀魯迅的歷史小說，差不多每篇都是有某史事根據的，態度是極其認真的，例如不周山（即補天），他便是想藉佛洛易特的精神分析學說，以「性」的發動，創造和衰亡來解釋創造——人與文學——的緣起的，這兒，我們當然不能拿今日的科學的眼光來批判魯迅當時的理論，這是有其歷史與時代的限制的，但是，他的這種對於歷史採取批判的態度，却是表現其百分之百的他的處理用歷史材料來寫小說的認真的現實主義者的態度。再如理水裏面，他一反當時風靡於我國歷史學界的顧頡剛等「古史辨」派的「大禹大蟲」說，他不把禹寫成「虫」，也不寫成「神」，而寫成一個堅苦卓絕為人類大眾謀福利的「人」；再如出關，他天才地如實地獨創地描劃了所謂「孔老之爭」，關於這，他在且介亭雜文末編裏的出關的跋一文中說：

「老子的西出函谷，爲了孔子的幾句話，並非我的發見或創造，是三十年前在東京從太炎先生口頭聽來的，後來他寫在諸子學略說中，但我也並不信爲一定的事實；至於孔老相爭，孔勝老敗却是我

的意見：老，是尙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尙柔，但孔以柔進取，而老却以柔敗退。這關鍵，就在孔子爲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鬆的實行者，老子則是無爲而不爲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談家。」（頁四二）

不僅如此，魯迅在歷史小說創作的細節上，也無不作精確的考據，這一類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在《理水》裏，有這末一段話——

——「你也講幾句好話我聽呀。」

「哼，我有什麼說呢？」禹驚訝的回答道。「我就是想，每天學學！」

「什麼叫作學學？」皋陶問。

「洪水滔天，禹說，「浩浩懷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裏，我走旱路坐車，走水路坐船，走泥路坐櫈。走山路坐轎，到一座山砍一通樹，和益倆給大家有飯吃，有肉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倆給大家有難得的東西吃，東西不够，就調有餘，補不足。搬家，大家這纔靜下來了，各地方了成個樣子。」

「對啦！對啦！這些話可真好！」皋陶稱讚道。——

而其實，這卻是史記夏本紀裏的譯文而已。——

——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曰學學。」皋陶難禹曰：「何